

## 胡寅《斐然集》的流傳及其現存版本考

陳曉蘭

**【內容提要】** 本文通過對胡寅《斐然集》的流傳以及傳世諸本的梳理和考察，力圖揭示現存各種版本的流傳情況、面貌特點及其相互源流關係，並重點對其中流傳最廣的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改竄與訛脫情況例舉說明，以期為《斐然集》的整理與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 《斐然集》 流傳 版本

DOI:10.13540/b.cnki.scct.2017.00.004

《斐然集》三十卷，宋胡寅撰。胡寅（1098—1156），字明仲，號致堂，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胡安國養子。徽宗宣和三年（1121）進士。欽宗靖康初，除秘書省校書郎，從楊時受學。高宗建炎三年（1129）為起居郎，上書切直，為宰相呂頤浩所惡，歸居湘潭家中。紹興五年（1135）遷中書舍人，後出知嚴州、永州。八年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尋直學士院，丁父憂。十年，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十二年致仕，歸居衡州。二十年為秦檜所忌落職，又被劾，新州安置。二十五年秦檜死後復舊官。次年卒，年五十九。所著有《讀史管見》、《崇正辯》、《斐然集》傳世，《論語詳說》已佚。生平見於《宋史·儒林傳》<sup>①</sup>。

《斐然集》比較系統完整地收錄了胡寅平生所作各種詩文，是全面呈現其生平志趣、創作交遊、政治立場、思想學術的最重要的內容，也是後人研究其人其學以及這一時期歷史、政治和學術思想發展的珍貴資料。全書三十卷，詩文分體編排：卷一、二賦、古詩，卷三至五律詩，卷六表，卷七、八啟，卷九奏狀，卷一〇、一一劄子，卷一二至一四外制、內制，卷一五繳奏，卷一六、一七書，卷一八小簡，卷一九序，卷二〇、二一記，卷二二書解，卷二三故事，卷二四史傳，卷二五行狀，卷二六碑銘，卷二七祭文、挽詩，卷二八題

<sup>①</sup>（元）脫脫等《宋史》卷四三五，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2916—12922頁。

跋，卷二九策問，卷三〇雜著。此集當是由胡寅子侄輩根據家藏舊稿整理編集而成，收錄詩文較為全備，內容可信。南宋時期《斐然集》先後兩度刊刻，一為寧宗嘉定三年（1210）鄭肇之刊本（簡稱嘉定本），一為理宗端平元年（1234）馮邦佐重刊本（簡稱端平本）。嘉定本卷首章穎序曰：“三山鄭君肇之持節湖湘，得是文於致堂之猶子大時，遂取而刊之木。”鄭肇之於嘉定元年八月提舉湖南常平，十一月除湖南運判，可知嘉定本是鄭肇之從胡寅弟胡宏之子胡大時處獲得胡寅詩文稿後在湘中予以刊行。理宗端平元年春，知敘州馮邦佐重刻《斐然集》於州治之內的東州道院。書名題“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首有端平元年九月戊申魏了翁序和章穎原序。入元以後，《斐然集》再未見重刻。筆者此前已撰文對《斐然集》的編纂與刊刻情況加以探討<sup>①</sup>，本文則重點對此集的流傳以及目前存世版本進行梳理和考察。

宋元時期，《斐然集》多有流傳。南宋趙希弁《讀書附志》卷下著錄“《致堂先生斐然集》三十卷，右禮部侍郎胡寅字明仲之文也，章穎為序”<sup>②</sup>，即嘉定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著錄“《致堂斐然集》三十卷”<sup>③</sup>，《宋史·藝文志》著錄“《斐然集》二十卷”（“二”當作“三”，本傳作“三十卷”），則不明為何種刊本。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著錄“《致堂斐然集》三十卷”，引據陳氏《解題》<sup>④</sup>。胡寅詩文雖多見錄於宋元人的著作，但其別集《斐然集》卻鮮見標引。南宋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壬午內禪志”中曾引《斐然集》：“而舍人胡寅草制云：‘朕為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於一身。選於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傳。’《斐然集》。由是人皆曉然知上意也。”<sup>⑤</sup>《雜記》成書於寧宗嘉泰二年（1202），時《斐然集》尚未刊行，故李心傳所據當為抄本。而檢諸今傳《斐然集》諸本，皆無此篇。稍後成書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引錄了胡寅的若干奏狀、劄子，然未標引《斐然集》。因《要錄》成書於嘉定三年之前，故其取材或出於《斐然集》

① 陳曉蘭《胡寅〈斐然集〉編纂與刊刻略考》，《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十五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②（宋）趙希弁《讀書附志》，（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下冊第1194頁。

③（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32—533頁。

④（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三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下冊第1893頁。

⑤（宋）李心傳撰，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下冊第499頁。

抄本，或出於其他文獻。

明代以後，《斐然集》雖仍見諸公私目錄的著錄，但流傳日漸稀少。正統六年（1441）楊士奇等人所編《文淵閣書目》卷九“日字號第三廚書目”載：“胡致堂《斐然集》，一部十冊殘闕/一部十冊闕。”<sup>①</sup> 錢溥抄錄《文淵閣書目》、後又經其子錢山合編而成的《秘閣書目》載：“胡致堂《斐然集》十。”<sup>②</sup> 萬曆三十三年（1605）張萱等人所編《內閣藏書目錄》卷三載：“《斐然集》九冊不全，宋致堂先生胡寅著，凡三十卷，闕十一至十四卷。”<sup>③</sup> 明代文淵閣、內閣、秘閣實為同一處藏書之所，其中《斐然集》已有殘闕，並非全帙。《萬曆廣東通志》卷六三著錄“致堂斐然集胡寅撰”<sup>④</sup>。萬曆四十四年陳第編定的《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著錄“《胡致堂集》三十卷寅”<sup>⑤</sup>。以上著錄諸本均未明是刻本或抄本。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五雖著錄“胡寅《斐然集》三十卷”<sup>⑥</sup>，但存佚無考。

明代永樂年間所修的《永樂大典》和《歷代名臣奏議》分別收錄了胡寅的若干詩文和奏疏。今存《永樂大典》殘卷中所見胡寅詩文，共計詩 16 篇、文 16 篇，除了有 3 篇詩的出處分別作“胡致堂詩”、“胡致堂斐然集”和“胡寅詩”之外，其餘皆作“胡寅斐然集”。這些詩文俱見於《斐然集》，與傳世諸抄本相校略有異文。其中有些文字具有重要校勘價值，可以校正傳世本中的訛誤。如文淵閣本卷一《送余澤還義興》中“朱樓婉婉托旅夢”中“婉婉”<sup>⑦</sup>，傳世本皆同，《永樂大典》卷七九六二作“婉婉”；卷五《示臨川曾革》中“繫馬行雲淨，飛觴梅雪稠”中的“行”字，文津閣本同，明抄本與清經鉅堂本脫，《永樂大典》卷一三三四四作“竹”；卷二七《祭顏翼》中“我於爾時追隨人事，趨走頻煩”中“我於爾”三字，文津閣本作“俯仰同”，明抄本與清經鉅堂本空格注“闕字”，《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作“維”。但也有多篇詩文存

①（明）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4 年版，上册第 88 頁。

②（明）錢溥、錢山《秘閣書目》，《明代書目題跋叢刊》上册第 662 頁。《秘閣書目》成書情況參見李丹《〈秘閣書目〉作者辨正》，《古典文獻研究》總第八輯，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2—187 頁。

③（明）張萱等《內閣藏書目錄》，《明代書目題跋叢刊》上册第 503 頁。

④（明）郭棐《萬曆廣東通志》，明萬曆三十年（1602）刊本。

⑤（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明代書目題跋叢刊》上册第 847 頁。

⑥（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

⑦ 本文所引《斐然集》文字，如無版本說明，皆據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在明顯誤字。如卷一《送余澤還義興》中“十倍”，《永樂大典》誤作“不倍”；卷一《遊雲湖》中“千葉”，《永樂大典》卷二二六六誤作“十葉”；卷二《題傅氏真意堂》中“相期”，《永樂大典》卷七二四〇誤作“相欺”；卷三《臘雷春雪示吉甫》中“火浣”，《永樂大典》卷一三三四四誤作“火院”；卷二八《題畢西臺墓誌後》中“銘文”，《永樂大典》卷二〇二〇五誤作“欽文”。從這些誤字情況來看，雖然不能完全排除《永樂大典》的抄錄錯誤，但更有可能是當時抄錄所據的《斐然集》已非宋刻本而是已有訛誤的抄本。明代黃淮、楊士奇等人奉敕所編《歷代名臣奏議》<sup>①</sup>收錄胡寅的奏議，主要集中在《斐然集》卷一〇、一一的劄子、卷一五的繳奏與卷一六《上皇帝萬言書》。所錄奏議總體上文字完整準確，可以為《斐然集》提供重要的校勘依據。如文淵閣本卷一一《進萬言書劄子》，“鴻慈天覆”中“鴻”字，文津閣本同，明抄本與經鉅堂本誤作“實”，《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六作“實”；卷一六《上皇帝萬言書》中“南郡”，文津閣本同，明抄本與經鉅堂本誤作“南郡都”，《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六作“南都”。但其中仍有個別誤字，如明抄本與經鉅堂本《上皇帝萬言書》中“鄭穀”，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誤作“鄭鼓”，《歷代名臣奏議》誤作“鄭穀”。蓋其所據之本與宋刻原本面貌較為相近，或即宋本。

清代前期的《存寸堂書目》於“四十一別集”下著錄“宋板胡寅《斐然集》三十卷”，又於“四十五宋板書”下著錄“《胡致堂斐然集》三十卷，十冊，一套”<sup>②</sup>，可知此時宋板猶存。今宋本不見於各藏書機構的著錄，蓋已亡佚。據筆者知見所及，目前傳世共有十部明清抄本三十卷全帙，可分為明清舊抄本和清《四庫全書》本兩個系統。另有清法氏存素堂抄本《宋元人詩集八十二種》之《斐然集》三卷，抄錄了別集中卷二至卷四的詩作。今分述之。

## 一、明清舊抄本系統

舊抄本系統的明清抄本，題作“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共有四部：

1. 明抄本<sup>③</sup>，今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

二十冊。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四周雙邊，三魚尾，黑口。《函宋樓藏

<sup>①</sup>（明）黃淮、楊士奇等《歷代名臣奏議》，明永樂刻本。

<sup>②</sup>（清）佚名《存寸堂書目》，不分卷，黃氏士禮居抄本，嘉慶二十年（1815）黃丕烈校並跋，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sup>③</sup>《中國古籍總目·集部》誤作“明刻本”，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書志》卷八三著錄此本：“《致堂先生斐然集》明抄本，筮江上舊藏”，并錄卷首魏了翁、章穎二序<sup>①</sup>。陸心源將此本定為明抄本不知何據，而所稱“筮江上舊藏”恐有誤。《靜嘉堂秘籍志》卷三五稱“卷中有‘重光’白文、‘子宣’朱文二方印”<sup>②</sup>。此為康熙、雍正年間蘇州藏書家蔣重光（1708—1768，字子宣）的兩方藏書印，而陸氏可能僅據“重光”一印而誤以為是清初筮重光（1623—1692，號江上外史）舊藏。卷中又有“奕苞”白文、“葉九來”朱文二方印，可知之前此書為清初崑山藏書家葉奕苞（1629—1686，字九來）的插架之物。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有此本的膠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有此本的景照本<sup>③</sup>。

2. 清倪氏經鉏堂抄本（簡稱經鉏堂本），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十六冊。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綠格。黑口，四周雙闌，闌外有“經鉏堂重錄”五字。經鉏堂是清代望江藏書家倪模（1750—1825）的室名。此本後經徐坊（字梧生）、傅增湘遞藏，有“沅叔”、“傅印增湘”、“企驎軒”諸印。見於《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sup>④</sup>、《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三<sup>⑤</sup>。

3. 清抄本（簡稱上圖本），清佚名校補，今藏於上海圖書館。

五冊。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左右雙邊，單魚尾。有“遇者善讀”、“知聖道齋藏書”、“南昌彭氏”、“結一廬藏書印”、“仁齋朱復廬校藏書籍”、“徐乃昌讀”諸印，可知此本先後為彭元瑞（1731—1803）、朱學勤（1823—1875）結一廬以及徐乃昌（1868—1936）所度藏。彭氏《知聖道齋書目》卷四著錄此本：“《斐然集》胡寅，五本。”<sup>⑥</sup>朱氏《結一廬書目》卷四著錄“致堂胡先生《斐然集》三十卷計六本，宋胡寅撰，舊抄本，彭氏藏書”<sup>⑦</sup>，《別本結一廬書目》“鈔本·集部”著錄“《斐然集》三十卷宋胡寅撰，六冊”<sup>⑧</sup>。朱氏書目著錄為六冊，

①（清）陸心源《詒宋樓藏書志》，北京：中華書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② [日] 河田龍《靜嘉堂秘籍志》卷三五，《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七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2014 年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委託京都大學博士研究生廖明飛等人對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明抄本景照本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進行對校，本文所述明抄本版式特點與文字情況為廖明飛等人據明抄本景照本提供，謹致謝忱。

④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 2009 年版，第四冊第 1021—1022 頁。

⑤ 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北京：中華書局 2009 年版，第三冊第 1190 頁。

⑥（清）彭元瑞藏《知聖道齋書目》，《玉簡齋叢書》，《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十五），台北：大通書局 1989 年版，第 6266 頁。

⑦（清）朱學勤藏《結一廬書目》，《觀古堂書目叢刻》本。

⑧（清）朱學勤藏《別本結一廬書目》，《觀古堂書目叢刻》本。

疑有誤。

上圖本原抄屬舊抄本系統。原抄之後，此本又有至少三次的校補。其一，在原抄卷一之前，補抄卷一起始的兩篇賦——《原亂賦》、《送吳郭賦》，且在卷端題“致堂胡先生斐然集第一”，與原抄卷一首題重複。其二，零星的墨筆校改、校語，如目錄中卷一之下增入“賦”的標目，卷一《和吳元衡》第三句中“遂”改作“逐”，《和仁仲賞梅》中“清薰要”下旁校補“看”字，卷一九《上蔡論語解後序》中“穿”字下旁校補“鑿附會”三字；又卷一〇《謝御札促召家君劄子》一文有墨筆簽條“十九頁前一行失黨應做失當”。其中部分也可能是書手抄錄有誤後隨即增改之字。其三，朱筆通校，對全書目錄、正文三十卷（包括補抄的二賦）的大量訛脫錯亂進行校改、校補，在目錄卷一墨筆所增“賦”的標目下添二賦篇名，且在原有墨筆旁校所補文字下斜劃以示增入正文。出校字句多與四庫本同，不避清諱。在卷二〇《岳州學記》中“必致爪掌之力；聖道蕩然，無執人者維之。自其說行，仰爪而明於天、持維而通於聖書<sup>①</sup>，未有一人焉。然則其所謂道德性命，徒言之而不可行”<sup>②</sup>五十四字前後標出起止，出天頭校語“宋板無此三行”。從朱筆校補之後仍留有部分闕字和誤字來看，其所據“宋板”可能並非宋本原刻而是源出宋本的抄本，與四庫本的底本面貌相近，與上圖本原抄的祖本或有同源性。上圖本的原抄與校補內容均已不明出於何人之手。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著錄“《斐然集》三十卷鈔本”，錄魏、章二序及董康所撰提要<sup>③</sup>。從其所錄胡寅題銜以及提要中所稱“卷一、卷二古詩”而不及賦作來看，此本為舊抄本系統的本子，且並無校補內容。1913年劉承幹收購朱氏結一廬藏書，如此本是朱氏藏書，則校補時間當在1913年之後，這一可能性似不太大。因此，《藏書志》著錄之本很可能並非今藏上海圖書館的朱氏藏本。

4. 清抄本，今藏於吉林大學圖書館。因正在整理未能借閱。

目前可以見到的明抄本、經鉅堂本與上圖本原抄雖在一定程度上猶存宋槧舊式，但多有錯亂、訛誤和脫衍，故絕非影寫宋端平本。

#### （一）三種舊抄本的文字情況

明抄本卷首，先後為魏、章二序，魏序無題，章序題“致堂斐然集序”。

① “書”疑當作“者”。

② 此段文字見於明抄本、經鉅堂本與上圖本原抄，四庫本無。

③ 繆荃孫、吳昌綬、董康撰《嘉業堂藏書志》，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558頁。

上圖本同，經鉅堂本章序在前、魏序在後。明抄本目錄部分，卷端頂格題“致堂胡先生斐然集目錄”，次行低一格題銜“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胡仲寅撰”，再次行低三格題“端平元年春重刊於東州道院”。其中唯所題銜名格式三本略異，明抄本一行直下，經鉅堂本與上圖本均低一格抄作二行，分別自“國男”和“開國”以下另行起。參諸南宋淳熙刻本《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首所題銜名作“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胡寅明仲撰”，亦是一行直下，故明抄本或更近宋刊原貌。至於舊抄本題名作“胡仲寅”，恐有訛脫，疑當作“胡寅明仲”。其下為分卷目錄，標以文體，卷末尾題“致堂胡先生斐然集目錄終”。正文卷一首行頂格題“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一”；次行詩題“寄張趙二相三首”，明抄本、經鉅堂本和上圖本分別低四格、三格和二格；三行起頂格書正文；卷末有尾題“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一”。卷中遇“陛下”、“皇帝”、“太祖”等空格，遇“皇宋”、“靖康”等另行起。

三種舊抄本存在大量相同的錯亂、訛誤和脫衍。目錄部分，如卷一“題全州礪巖”中“全”誤作“金”，卷四“又題草衣崑”中“草”誤作“山”，卷一四脫“折彥質贈父”、“張婕妤贈二代”二篇題。正文部分，如卷一無《原亂賦》、《送吳郭賦》（目錄中亦無賦體及二賦篇名）；《送黃彥達歸建安》，闕“面皴……亦無”共十九字；卷三《示黃岡長老二絕》，詩題中“二”誤作“三”，且僅錄第一首；卷四《過明田寺會楊李二生於碧玉三首》為七律，舊抄本將第二首的首句與第三首的後七句合為一首，脫第二首的後七句和第三首的首句；卷二〇《企踈堂記》，脫“樂則行之不以進為泰是故聖人之道高”十六字。脫衍以及因形近、聲近而誤之例，不勝枚舉，幾不堪卒讀。可見，這三種舊抄本源出同一個端平本系統的多有訛亂的祖本。

## （二）三種舊抄本之間的關係

三種舊抄本中，明抄本和經鉅堂本的文字面貌更為相近，二者與上圖本原抄相校有較多異文。如卷二《同蔣德施諸人賞簡園梨花》，詩題中“蔣德施諸人”，二本皆作“將德施諸人”，上圖本作“友人”；而正文中“喚”、“高”二字，三本皆空格闕字。又如卷五收錄《酬黃執禮見和》與《和黃執禮六首》，二本在五律《酬黃執禮見和》詩之後抄錄七律《和黃執禮六首》的後五首，《和黃執禮》題下僅餘一首，而上圖本則不誤。又如卷二五《先公行狀》自“筵而諫臣”至“上章謝事”，二本三段文字顛倒；卷二六《左朝散郎江君墓誌銘》自“舊歌詠”以下，及《左朝請大夫王公墓誌銘》，至《處士魏君墓誌銘》

“大不天先君”，二本六段文字顛倒；而上圖本則無此錯簡之誤。

至於另有一些上圖本原抄脫誤而二本不誤之處，已難以判斷是其所據底本如此抑或是抄錄有誤之故。如卷二二《無逸傳》脫“明貧者……智詐愚”與“不敢有……遊田”兩段，卷二五《先公行狀》脫“方以臧……特改良輔”一段，均有朱筆校補。

而明抄本和經鉅堂本之間的異文較少，且多涉形近之字。有的是明抄本不誤而經鉅堂本誤或有脫文，如卷一一《請行三年喪劄子》，明抄本“革漢景之薄俗”中“革”字，經鉅堂本誤作“草”；卷一一《乞回避呂頤浩張守呂祉劄子》，明抄本“未有”，經鉅堂本脫“未”字；卷一四《李彌遜直竇文閣知吉州》，明抄本“刑弊”，經鉅堂本誤作“利弊”。有的是經鉅堂本不誤而明抄本誤或有脫文。如卷一《和韓司諫叔夏樂谷五吟·竹枕》，經鉅堂本“清渭”，明抄本誤作“青渭”；卷一三《范正平贈直秘閣》，經鉅堂本“堙微”，明抄本脫“堙”字。由此可見，明抄本和經鉅堂本之間並無傳抄關係，其所據底本相同或相近。

## 二、清《四庫全書》系統本

舊抄本系統之外，又有清四庫本系統的抄本，題作“斐然集”，共有六部：

1. 文淵閣本，今藏於台灣“故宮博物院”。
2. 文溯閣本，今藏於甘肅省圖書館。
3. 文津閣本，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4. 文瀾閣本，今藏於浙江省圖書館。
5. 清八千卷樓藏本（簡稱南圖本），今藏於南京圖書館。

此本從文瀾閣本抄出，六冊。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四字，四周雙邊，單魚尾。有“八千卷樓藏書印”、“四庫箸錄”印。首冊卷首有丁氏題跋，寫於浮籤之上：“《斐然集》三十卷。抄細字本。/《書錄解題》題禮部侍郎胡寅明仲撰。……自來繕錄者，皆出自宋本。此本密行細字，通部完善，洵不易得也。”《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錄此題跋，個別文字有所改動<sup>①</sup>。卷首錄《斐然集》提要：“臣等謹案……乾隆五十年五月恭校上。”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此為文瀾閣本提要，與《四庫全書總目》以及文淵閣本、文溯閣本、文津閣本提要

<sup>①</sup>（清）丁丙、孫峻撰《善本書室藏書志》，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錢塘丁氏刻本。

均略有出入。

6. 清光緒孔氏嶽雪樓影鈔文瀾閣《四庫全書》本，十四冊，今藏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sup>①</sup>。

根據筆者所見之影印文淵閣本、影印文津閣本與南圖本，三種抄本面貌相近，無目錄。各本之間有異文，最爲明顯的一是文淵閣本、南圖本卷首冠有魏、章二序，文津閣本無魏序；二是文淵閣本卷一八《寄政府》、《寄趙秦二相》二文有八葉空白闕文，文津閣本、南圖本不闕。可知諸閣本抄錄和校訂所據底本與參校本不盡相同，且各自有所改竄，情況比較複雜。而據《四庫全書總目》的著錄，《斐然集》的底本爲“兩江總督採進本”，《提要》稱其“蓋猶從宋槧繕錄也”，可知爲源出宋本的抄本。此本蓋爲《四庫採進書目》中的《兩江第一次書目》所著錄的“斐然集（三十卷）宋胡寅著十二本。”<sup>②</sup> 未有他本見於著錄。另外上文已述及，上圖本原抄與明抄本、經鉅堂本相近，而其朱筆通校所據之本則與四庫本的底本面貌相近。

#### （一）四庫本與舊抄本系統的關係

四庫本所據之本，與舊抄本的祖本存在一定的淵源關係。如卷首魏序中“半年”與“次”兩處<sup>③</sup>，舊鈔本<sup>④</sup>闕字分別空二格與一格，而文淵閣本皆爲脫文。又有一些四庫本與舊抄本訛誤相同之例，如卷一《題全州礮巖》，“奮撞”當作“春撞”；卷二《賦向宣卿有裕堂堂在伊山桓伊舊隱也》，“唐濟”當作“康濟”；卷二一《新州州學御書閣記》，“十二年”當作“二十年”；卷二六《亡室張氏墓誌銘》，“涉縣”當作“沙縣”；《朝請郎謝君墓誌銘》，“業氏”當作“葉氏”。雖然不能排除宋刻原本誤字的情況，但更有可能則是因爲二者源出共同祖本所致。還有一些舊抄本的訛脫、闕字處，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往往有異文且或有誤的情況。如卷一《與范信仲及嚴陵同官納涼萬松亭》第四句，“酒”上舊抄本空格闕字，二本分別作“把”、“縱”；《遊雲湖》，“陳家”下明抄本與經鉅堂本作“注”、上圖本作“涇”，皆不合韻明顯有誤，二本分別作“匯”、“瀨”，而《永樂大典》卷二二六六作“涇”；卷二七《祭顏翼》，“時追隨

<sup>①</sup> 《中南、西南地區省、市圖書館館藏古籍稿本提要》，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85 頁。《中國古籍總目》未著錄。

<sup>②</sup> 吳慰祖校訂《四庫採進書目》，北京：商務印書館 1960 年版，第 35 頁。

<sup>③</sup> 據（宋）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五五《致堂先生胡公斐然集序》，《四部叢刊初編》影宋本。

<sup>④</sup> 下文“舊抄本”的文字，皆據明抄本、經鉅堂本。

人事”上舊抄本注曰“闕字”，二本分別作“我於爾”、“俯仰同”，《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作“維”爲是；卷三〇《龍山長老開堂疏》，“師”下舊抄本脫字，二本分別作“利”、“吼”。這些疑爲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擅添、擅改之處，也同樣揭示了四庫本與舊抄本可能存在的同源性。

## （二）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之同異

總體來看，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文字面貌相近。與舊抄本相校，兩種閣本各卷存在較多的相同訛脫，可知二本所據底本相同或相近。脫文相同之例：如卷七《答李校書啟》篇題中“校書”下脫“似表”，《賀湖南鈞漕啟》脫題下編者原注，卷一七《寄秦會之》中“窮也”下脫“於生民之利病當盡究也”一句，卷二〇《岳州學記》中“高遠”下脫“必致”至“可行”五十四字，卷二五《先公行狀》中“世宗之威行於”下脫“匈奴”至“之威行於”二十字。訛誤相同之例更是不勝枚舉：如卷一《題永倅廳康功堂》第二句中“明”當作“相”，《送茶與陳霆用賈閣老韻》首句中“相”當作“湘”，卷一〇《謝御札促召家君劄子》中“鄭居正”當作“鄭居中”，卷一三《董弇少常》與《董弇右司》篇題中“董弇”當作“董弁”，《張致遠戶部侍郎》中“司農”當作“司元”，卷一七《寄張德遠》中“任人”當作“任誼”，卷二六《右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翁公神道碑》中“當山”當作“常山”。

而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之間的異文，一部分是抄錄疏誤或是後經校訂、改竄所致，另一部分則是因爲二本在抄校全書或書中部分內容時參據本子有所不同。文津閣本卷首無魏序、文淵閣本卷一八《寄政府》、《寄趙秦二相》有八葉闕文，足見二本抄錄各有所據。而卷一《原亂賦》以及卷二至卷四中的二本異文，對於探討二本抄校所據各本情況頗有價值。《原亂賦》中的異文，文淵閣本多與上圖本同，文津閣本多與南圖本同，各有正誤。如文淵閣本、上圖本中的“朱綴”、“繹騷”、“血染”、“靡文”、“茲誦”、“及淮蔡”、“鬼域”、“辜少康”，文津閣本、南圖本分別作“珠綴”、“驛騷”、“血沾”、“彌文”、“絃誦”、“反淮蔡”、“鬼域”、“幸少康”。“聲兮廣袖颯以”六字，文津閣本以六格抄錄，上圖本闕文空五格，文淵閣本則是在五格中抄入六字以致此行多出一字，蓋是原闕後據別本補抄。據此推測，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抄錄此篇所據底本可能不同，前者與上圖本面貌更爲接近，且有據他本抄補之處。卷二至卷四的異文中，文淵閣本多與舊抄本同，文津閣本多與存素堂本同，其中大部分是前者有誤、後者不誤之例：如前者卷二《示吳守》中“善力”、《畫牛》中“收子”、卷三《元院冠》詩題均有誤，當據後者分別作“善刀”、“牧子”、“示阮冠”。

但也有個別前者不誤、後者有誤之例：如卷四《和趙廟欲携尊賞殘梅二絕》詩題中，前者“廟”字，後者誤作“廣”。還有一部分異文兩通，如卷四《用明有携酒賞梅之約久而未至復和以督之》，前者“小槽應注瀑”一句，後者作“短簷應挂瀑”。顯然，文淵閣本和文津閣本的抄校各有所據。但也有少量的例外情況。一是文淵閣本與存素堂本同、文津閣本與舊抄本同之例：如卷二《題四畫·屏山夜雪》，前者“踏雪”，後者作“路雪”；卷三首篇《古今豪逸……竇鄰爾》，前者“供鼓吹”，後者作“共鼓吹”。二是四庫本與舊抄本皆誤而存素堂本不誤之例：如卷二《和彥冲》，前者皆誤作“崢”，後者作“琤”爲是；卷二《賦向宣卿有裕堂堂在伊山桓伊舊隱也》，前者皆誤作“唐濟”，後者作“康濟”爲是。三是四庫本與存素堂本皆誤而舊抄本不誤之例：如前者卷四《送姜醫與能仁西堂印老能仁章甫讀書之地》詩題中“姜醫”二字有誤，當據舊抄本作“薑醬”；卷四《碧泉芍藥四首》之四中四庫本“裏”字有誤，存素堂本誤作“裏”，當據舊抄本作“裏”。從中可見，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可能都不同程度地參據了至少兩種底本，一種或與舊抄本同源，另一種或即存素堂本所從出的四庫底本。

### （三）四庫本的改竄與訛脫——以文淵閣本爲例

較之目前傳世的明清舊抄本，四庫本《斐然集》在文字方面略顯優長。但由於四庫本所據底本原有脫誤，抄錄過程中又不免錯漏，加之館臣在抄錄、校訂時的諱改、妄改，因此存在不少訛誤、脫漏之處。

對四庫本的質量損害最爲嚴重的是館臣的諱改與妄改，其中又以文淵閣本爲甚。文淵閣本中，凡“夷”、“狄”、“虜”、“犬羊”、“大明”、“腥膻”、“夷狄”等字詞以及相關內容，皆作刪改；金人名“粘罕”，多改譯“尼雅滿”；凡歷代帝王以及孔子、周公、關公等人的名諱，皆改字或闕筆以避諱。如卷首魏序中，“金狄入寇”改作“金人深入”、“夷虜”改作“敵國”；章序中，“夷夏雜揉”四字被刪、“夷狄亂華”改作“兵革紛紜”、“華夷”改作“名分”；卷一六《上皇帝萬言書》，“反常悖道、腥臊禽獸之粘罕”改作“侵凌強暴、反覆無常之尼雅滿”；卷二七《挽劉忠顯》，“牛羊闖草即開顏”改作“黑雲黃霧塞人寰”；卷三〇《敘古千文》所述九位周天子以及劉邦、劉備、李世民之名皆避諱改字，全不顧“此文敘古字凡千不重”<sup>①</sup>的體例。文津閣本的避諱總體上雖然不如文淵閣本嚴密，但亦有一些不見於文淵閣本的諱改之例，如卷二六《右

<sup>①</sup>（宋）李昉英《書胡致堂敘古千文後》，《文溪集》卷四，四庫本。

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翁公神道碑》中“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一句，文津閣本改作“外國者，中國之藩籬”；卷二九《零陵郡學策問》“微斯人，吾其左衽矣”，文津閣本改作“管仲之力也，如其仁”。

文淵閣本存在較多的脫漏、錯訛和改竄之處。其中與文津閣本訛脫相同或相關之例，蓋與其所據底本有關，上文已有述及。而僅見於文淵閣本或文津閣本的脫誤，有的是因底本之故，有的是因抄錄有誤，還有不少則是因館臣妄改所致。茲仿陳垣先生的《校勘學釋例》，重點對文淵閣本的訛脫情況略作分類例舉。<sup>①</sup>

1. 行款誤例：

(1) 闕文例：

文淵閣本除上文所述卷一八空闕八葉，另有個別字詞闕文，皆空格出注“闕”。卷一《和韓司諫叔夏樂谷五吟·瓦爐》，“緇黃手”下闕二字，舊抄本作“秉倭”，文津閣本作“中持”；卷二七《祭龍王長老法讚》，“乳”下闕一字，舊抄本作“漣”，文津閣本作“供”。此二處皆當以舊抄本為是，文津閣本疑為妄添。另有卷六《駕幸建康問起居表》，止於“阻於扈蹕”，明顯文意未完，各本皆同，文淵閣本在文末添注“闕”。

(2) 小注訛為正文

文淵閣本卷六《再表上二表既行累月……不應上表》篇題，文津閣本同，其中“再表”之下七十五字，據舊抄本當作小注。

2. 通常字句誤例

(1) 形近而誤例：

僅文淵閣本誤：如卷一《原亂賦》，“分”當作“兮”、“茲”當作“絃”；《示上封長老洪辯》，“跋”當作“跂”、“盲”當作“育”；《和吳元衡》，“頌”當作“煩”；《和元衡送牡丹》，“生”當作“坐”；卷二《和彥冲》，“歷”當作“鴈”；卷三《初至青湘聞安仁帥司為曹成所襲四首》，詩題中“青”當作“清”；《題上饒半月岩四絕》之二，“差”當作“羞”；《和信仲喜雨二首》之二，“漏”當作“滿”。僅文津閣本誤，如卷一《原亂賦》，“珠”當作“朱”，“逵”當作“達”；《送吳郭賦》，“建”當作“逮”；《送余澤還義興》，“客”當作“容”；卷一二《趙樜大理寺丞石淑問軍器監丞》，“戒”當作“戎”。二本皆誤：如卷一《題全州礪岩》，“髮”當作“鬢”；《題永倅廳康功堂》，“明”當作

① 文中所舉訛脫之例，均可據舊抄本及其他材料校正、校補，為免繁複，不再一一說明。

“相”；《遊雲湖》，“家”當作“冢”，“住”當作“往”。

(2) 聲近而誤例：

僅文淵閣本誤：如卷三《和余汝霖雪七絕》之三，“席”當作“夕”；之六，“新”當作“清”；《和錢孫叔委心亭二絕》之一，“霧”當作“務”。僅文津閣本有誤：如卷二《曉乘大霧訪仲固》，“里”當作“理”。二本皆誤：如卷七《答劉帥啟》，“慶”當作“罄”；卷八《代人賀方帥自桂移廣啟》，“念”當作“驗”。

(3) 脫文例

除上文所舉與文津閣本相同的脫文之例，另有一些脫文僅見於文淵閣本。如卷首章穎序，末字“序”字前脫“謹”字；卷五《周尉丹砂次其韻》詩題，“周尉”下脫“惠”字；卷一四《故楊時父贈正議大夫》篇題，“父”下脫“恕”字；卷二一《會享亭記》篇題下脫小注“丙寅冬十月”；卷二二《無逸傳》，“懼矣”下脫“好覈實，則下不敢矯飾矣；好明白，則下不敢讒譖矣”二十字。亦有一些脫文僅見於文津閣本。如卷一《原亂賦》，“洞壑”前脫“瞰”；《題涪溪碑》，“翠華東”下脫“巡朝太清”四字；多篇詩文（如卷七《謝貢啟》、《問候張相啟》、《答湖北趙憲啟》、《謝趙鹽啟》、《答劉帥啟》、《答崇安詹令啟》和《答鄧倅柞啟》）脫題下所注干支。

(4) 衍字例

僅文淵閣本誤：如卷一六《上皇帝萬言書》，“潰叛者”中“者”字衍；卷二五《先公行狀》，“而得其傳者”中“而”字衍，“朕亦不加罪”中“亦”字衍。

(5) 妄改例

妄改是四庫本中各類訛誤產生的重要原因，此處僅舉以下三種情況。

A. 不明文義而妄改

僅文淵閣本誤：如卷一《原亂賦》，“恥籌畧之衆詘兮，得氣去而弗追”中“恥籌”當據上圖本、文津閣本、南圖本作“傳報”，前文已謂“我舊學之老傅兮，何執計之不臧。皇洞監其不任兮，割邦寄於爰立。傅忿懟而懷戾兮，怵自營而增急……”，均是對耿南仲在欽宗靖康年間的表現的斥責之詞；卷五《和李靖》，“三間茅屋陋無人”中“人”當作“宸”，宸指屋簷；卷七《答沅州王守東卿啟》，“問安嘗藥，情既戀於板輿；剡奏叫閭，願獲從於琳館”中“情既戀”當作“復難奉”；卷一二《范正已降兩官罷宣撫處置司參議》，“元戎露章，罪狀顯著”中“顯著”當作“離間”，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七，吳玠

言范正己等“離間將帥，有害軍機”<sup>①</sup>；卷二〇《旅堂記》，“彼斷者不可復續，誤而不慎，後將噬臍”中“不慎”當作“斷斬”。二本皆誤：卷七《答路樞賀年啟代家君》，“若木餞餘寒之氣”中“若木”，文津閣本作“草木”，當作“菝木”，其父胡安國《元日》詩有‘競裝菝木餞餘寒’之句<sup>②</sup>；卷二七《祭陳少卿幾叟》，“獨長松鬱乎蒼翠”中“翠”字不合韻明顯有誤，文津閣本誤作“官”，當作“芊”；《祭顏翼》，“見子所著，干祿之文”中“著”，文津閣本作“書”，當據舊抄本、《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作“業”。僅文津閣本誤：卷二《賦吳守友石臺》，“穿迫”當作“迫窄”，存素堂本誤作“迫穿”。

#### B. 疑臆改底本訛闕而誤

上文已述，由於四庫本的底本與舊抄本系統或存同源關係，因此四庫本的有些訛誤疑是因臆改底本訛闕而致誤。除上文所及，另舉數例。僅文淵閣本誤：卷首魏序，“心法”中“法”，舊抄本闕字，當據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五五《致堂先生胡公斐然集序》作“粹”，連下為句；卷一〇《謝御札促召家君劄子》，“例察提舉學事官”中“察”字，舊抄本誤作“際”，當據文津閣本作“除”；卷二六《資政殿學士許公墓誌銘》，“而共知事君之有犯而無隱也”中“共知”，舊抄本誤作“其知”，當據文津閣本作“知其”。二本皆誤之例：卷二〇《義齋記》，“萬變遷代”中“遷代”，舊抄本誤作“千代”，當據明《嘉靖延平府志·藝文志》卷一作“千化”<sup>③</sup>；卷二五《先公行狀》，“失其居則惑人也”中“惑”，文津閣本作“妄”，舊抄本誤作“族”，當據宋衛湜《禮記集說》卷一四九作“旅”<sup>④</sup>。

#### C. 以同義近義字、通行字改字

有些文字，舊抄本可能保存宋本原貌，文淵閣本則易以同義近義字、通行字。以同義近義字改：卷三《初至青湘聞安仁帥司為曹成所襲四首》之一和卷五《和單令自龍山迎月而歸》中“問信”當作“問訊”；卷九《辭免再除起居郎奏狀》與《永州辭免召命奏狀》中“俟履”當作“俟履”；卷二七《祭孫判監奇父》中“吐壺”當作“唾壺”。以通行字改：如“擦”作“擦”，“趨”作“趨”，“謾”作“漫”，“蜚”作“飛”，“睥”作“悍”，“襄羊”作“相羊”，“切”作“竊”，“頗類”作“頗類”等；又如卷四《酬任正叔見和》，“潦草荷

①（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四庫本。

② 舊題（宋）劉克莊編《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卷三，元刊本。

③（明）陳能修、鄭慶云、辛紹佐纂《嘉靖延平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本。

④（宋）衛湜《禮記集說》，清《通志堂經解》本。

鋤開菊徑”中“潦草”，當據其餘諸本作“老草”。“老草”是唐宋時口語詞，意為倉促草率，後寫作“潦草”。

(6) 誤乙例：

僅文淵閣本誤：如卷一《題永倅廳康功堂》，“花好”當作“好花”；卷二《曉乘大霧訪仲固》，“受坐”當作“坐受”；卷三《再和》之四，“但可”當作“可但”；卷六《進先公文集表》，“性情”當作“情性”；卷一六《上皇帝萬言書》，“賞爵”當作“爵賞”；卷二七《祭劉待制彥脩》，“跨驢繼祥，夜飲達晨”二句當作“夜飲達晨，跨驢繼祥”。僅文津閣本誤：如卷一《和吳元衡》，“酬醅”當作“醅酬”。二本皆誤：如卷一五《繳宣諭官明橐乞封龍母五子》，“獄冤”當作“冤獄”；卷二〇《義齋記》，“疾痛”當作“痛疾”。

(7) 疑擅添例

文淵閣本的有些文字疑底本原無，為館臣擅添。如卷一二《鄭滋顯謨閣學士宮祠》，篇題中“顯謨閣學士”，舊抄本目錄及正文、文津閣本皆作“顯學”；又如卷二四《諸葛孔明傳》中有四處僅見於文淵閣本的文字，疑是館臣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正文及裴松之注擅添：“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中“郭攸之”、“攸之、禕、允之任也”中“攸之”、“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中“攸之”以及自“況臣才弱”至“猶有此失”六十一字，皆不見於其他諸本而出於《三國志》，且文淵閣本中這些字句後數行的每行字數有所增多，明顯是添文所致。

3. 名物典故誤例

(1) 不諳人名而誤例

僅文淵閣本誤：如卷一《題關雲長廟》，“智顛”當作“智顛”；卷一三《种思道諡忠憲》，篇題“种思道”當作“种師道”。二本皆誤之例，除了上文所及“鄭居正”當作“鄭居中”，“董弇”當作“董弁”，“任人”當作“任誼”，另有數例：如卷一五《繳程千秋乞不以有無拘礙奏辟縣令》，“程書禹”當作“程昌禹”；卷二五《先公行狀》，“冲良”當作“仲良”；卷二六《右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翁公神道碑》，“象之”當作“蒙之”。

(2) 不諳地名而誤例：

僅文淵閣本誤：如卷一六《上皇帝萬言書》，“襄陽”當作“襄漢”；卷二五《先公行狀》，“東南”當作“東禺”，“西北”當作“西桂”。二本皆誤之例，除了上文所及“當山”當作“常山”，另有數例：如卷一七《代人上廣帥書》，“閩甄”當作“閩甌”；卷一八《寄參政》，“河北”當作“湖北”；卷二六《左

宣教郎江君墓誌銘》，“文武”當作“邵武”，文津閣本誤作“郡諸”；卷二八《跋唐十八學士畫像》，“子方”當作“春州”，文津閣本誤作“某州”。據宋劉摯《唐質肅神道碑》<sup>①</sup>，唐介字子方，仁宗皇祐中以直言貶春州別駕，後改英州，天下士大夫聞風歎慕。

（3）不諳典制而誤例：

僅文淵閣本誤：如卷七《答湖北趙憲啟》，“進司三事”中“事”當作“字”，三字原為知制誥的別稱，後又指中書舍人，此前一年即紹興五年，胡寅為中書舍人，故云；《答李校書啟》，“南極”當作“東壁”，東壁指宮中藏書、校書之所；卷一八《寄張相》，“湖北監軍董補之”中“監軍”當作“鹽香”，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八，紹興五年湖北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董補之被汰；卷二五《先公行狀》，“弓手”當作“弓級”。卷二六《右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翁公神道碑》，“臣請於讞狀列囚之日，必使大理刑部得以檢察”一句中“日必”當作“戶等”。二本皆誤：如卷三《留別唐次山》，“喜逢迎”當作“奉真廷”，文津閣本誤作“遇豐年”，存素堂本誤作“逢真定”，真廷為宮觀之別名，此詩作於紹興十二年，胡寅辭知永州，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觀，故云；卷七《答鎮江劉待制啟》，“入持筆橐”中“筆橐”當作“從橐”，文津閣本誤作“鈞軸”；卷一一《戊午上殿劄子》，“而一枰之上，無有生眼，亦不待戰罷計子而後知其敗也”中“子”當作“路”，文津閣本誤作“虧”，宋代圍棋使用數路法；卷一三《張致遠戶部侍郎》，“往佐司農”中“司農”當作“司元”，司元指戶部；卷一五《繳程千秋乞不以有無拘礙奏辟縣令》，“差遣”當作“差注”；《再論朱勝非》，“鹽務”當作“鹽香”。

（4）不諳典故而誤：

僅文淵閣本誤：如卷七《答朱鹽啟》，“功比臨淮之李”中“李”當作“季”，東漢朱暉字文季，為臨淮太守；卷一二《李健直秘閣督漕》，“金版六韜，又能詳說”中“詳”當作“從”，《莊子·徐無鬼》有“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之句；卷二七《祭陳少卿幾叟》，“紛身外其又奚言”中“身”當作“券”，《莊子·庚桑楚》有“券外者志乎期費”之句；《祭劉待制彥脩》，“因悟《南華》，凡有皆妄”中“有”當作“溢”，《莊子·人間世》有“凡溢之類妄”之句。二本皆誤：如卷一九《魯語詳說序》，“殊途各出”當作“自殉殊面”，文津閣本誤作“自殊殉橫”，此語出於《莊子·則陽》。

<sup>①</sup>（宋）劉摯《忠肅集》卷一一，四庫本。

文淵閣本、文津閣本中存在的改竄、脫漏和訛誤之處，均可參校舊抄本并參據《歷代名臣奏議》、《永樂大典》、宋人別集、明代方志等引錄材料進行校補、校正。由此可見，舊抄本雖多錯訛脫衍，但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校勘價值。

### 三、清法氏存素堂抄本《宋元人詩集八十二種》之《斐然集》三卷（簡稱存素堂本），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墨格。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版心下方有“存素堂鈔本”。卷一首頁下方有法氏“詩龕鑑臧”方印。清乾隆年間，法式善參與編纂《四庫全書》時，借四庫館的底本令人抄出大量宋元人詩集。其《宋元人集鈔存序》稱：“乾隆三十七年，詔開四庫書館……法式善備員編纂，十年中三役其事，因得借本，廣付鈔胥。……閱十五年，得宋人集八十九家七百七十七卷，元人集四十一家三百二十八卷。”<sup>①</sup>今存世八十二種，《斐然集》三卷即為其中之一。然其《陶廬雜錄》卷三記述“借四庫底本”所抄宋元人集的書名、卷數，稱“胡寅《斐然集》四卷”<sup>②</sup>，不明卷數何以有異。《斐然集》三十卷中前五卷收錄胡寅詩，存素堂本僅抄錄其中卷二至卷四的詩作，無卷一和卷五的內容。各卷首題分別作“斐然集卷一”、“斐然集卷二”、“斐然集卷三”，次行下題“宋胡寅著”，低二格書詩題，頂格錄正文。各卷尾題分別誤題作“斐然集卷二”、“斐然集卷三”、“斐然集卷四”，當是沿用別集原卷數所致。這也許是法氏將《斐然集》卷數誤記為“四卷”的原因。

總的來看，存素堂本的文字質量勝於舊鈔本系統和四庫本系統的本子。遇“玄”、“曄”字皆不避諱，唯別集卷二《以墨一品餉叔夏》中“燁”字，存素堂本作“燦”，或底本原文如此。仍有個別闕字和誤字，別集卷二《賦吳守友石臺》，“林筍”誤作“林箏”，“迫窄”誤作“迫穿”；卷三《和賈閣老三首》之一，“塵”字闕；《和唐壽隆上元五首》之二，“法”字闕。

上文已述，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抄校所據本子至少有兩種，一種與舊抄本同源，一種或即存素堂本所從出的四庫底本。鑑於存素堂本與舊抄本有比較明顯的差異，二者當為不同系統的本子。卷二至卷四中，文津閣本的文字多與存素堂本同、文淵閣本的文字多與舊抄本同，而這三卷中兩種閣本的異文數量較

①（清）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二，清嘉慶十二年（1807）刻本。

②（清）法式善《陶廬雜錄》，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刊本。

之別集其餘各卷明顯增多，似乎也不能排除四庫本抄校所據的本子並非三十卷全帙而僅此三卷的可能。

後世《斐然集》以文淵閣本最為通行。1935年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簡稱《珍本》）據此本影印，個別文字有異，蓋因影印時筆畫模糊缺失所致。如文淵閣本卷一《題全州礪巖》中“冷然”與卷二《同蔣德施諸人賞簡園梨花》中“玉花”，《珍本》分別作“冷然”與“王花”。1982—1986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以重印。1993年中華書局出版容肇祖點校的《崇正辯 斐然集》，《點校說明》中並未明言《斐然集》所據底本，但從其文字判斷當為《珍本》，其中卷二至卷四的詩作參校了存素堂本。2009年嶽麓書社出版尹文漢校點的《斐然集 崇正辯》（簡體橫排本），此集亦以影印文淵閣本為底本。《全宋詩》、《全宋文》收錄胡寅詩文，皆以影印文淵閣本為底本，雖以經鉅堂本和存素堂本為校本，但並未作全面校勘。《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則於2005年、2010年先後兩次影印出版。

本文通過對胡寅《斐然集》的流傳以及傳世諸本的梳理和考察，力圖揭示現存各種版本的流傳情況、面貌特點及其相互源流關係，並重點對其中流傳最廣的文淵閣本的改竄與訛脫情況加以例舉說明。這一研究內容，貫穿了筆者校點整理《斐然集》過程的始終，它既構成了校勘工作的前提和基礎，同時也是校勘成果的呈示和總結。希望筆者對《斐然集》的整理和研究，能為學界更全面、準確地利用、研究《斐然集》提供參考。其中疏誤之處，敬請學界同人指正。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